

《六韬》的作者及其流传考

张林川

《六韬》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奇书。

它的“奇”，首先表现在书的内容方面，它是一部讲韬略的书。韬者，它又作“弢”，原意是“弓袋”，引申之则有“锦囊妙计”的意思。其次，据文献记载，这部书与历史上两位传奇的智人有关。有文献记载，《六韬》的作者就是周文王的老师姜太公；又有文献记载，张良曾习《六韬》助刘邦除暴秦、败项羽，平定天下建立了刘汉王朝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：“良数以《太公兵法》说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。”据宋人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十二引用唐人李靖的话曰：“张良所学，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是也。”一说《太公兵法》、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皆太公兵法也，都是姜太公所作；一说《三略》为秦末汉初的隐士黄石公所作。黄石公，即在下邳（今江苏邳县）圯桥上传书给张良的老人，所谓下邳神人是也。传书的故事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有较详细的记载。另外，唐、宋以前的文献征引这部书或征引与这部书内容相关的资料也不少。有关太公的兵法，后人又有辑佚，内容有同有异。所有这些，使这部书蒙上神奇色彩。

总而言之，从撰者到流传以及内容，《六韬》是一部很有研究价值的书。

一、历代有关《六韬》作者的讨论综述

这是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。由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有异，《六韬》文字内容不一致，致使研究者各执一端，相互排斥，把问题弄得非常复杂。这里有必要理清各家之说，然后从中找出比较正确的答案。

1. 姜望撰说。

目录学著作最早明确著录姜望撰的是：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《太公六韬》五卷，梁六卷。周文王师姜望撰。

所谓“梁六卷”，当指南北朝梁阮孝绪《七录》著录有六卷。《隋书》著录时是五卷，故云“梁六卷”。随后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云：“《太公六韬》六卷。”虽不署撰人，但以“太公”名书。另有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·兵家类》：“《六韬》六卷。右周吕望撰。按：《汉艺文志》无此书，梁、隋、唐始著录，分文、武、龙、虎、豹、犬六目，兵家权谋之书也。”

2. 非姜望撰，也非后人伪托说。

持此观点者主要有清人孙星衍：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类：“《周史六弢》六篇。惠、襄之间，或曰显王时，或曰孔子问焉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即今之《六韬》也，盖言取天下之军旅之事，弢与韬字同。”

孙氏作有《六韬序》，他主要援引上述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类的著录，以《庄子·徐无鬼》、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为旁证，论证“《六弢》出于周显王之前，宜魏武侯时女商见之”。他十分赞同颜师古注，认为“弢”字与“韬”字同，《汉书》著录的《六弢》与世传《六韬》为一书。那么《六弢》既是兵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为什么将它列入“儒家类”而不入“兵家类”呢？孙氏进一步解释道：“《六韬》先以仁义道德取天下（其中第一篇《文韬》专论仁义道德），故班史列之儒家”，犹如《司马法》（兵书）

入礼家，治军在古代为五礼之一。《序》中批评《隋书》改《六韬》入兵家，并批评阮孝绪不察《汉书》周史为周显王时人，妄题姜望撰，《隋书》荒谬，阮孝绪更为荒谬。此序1500余字，是孙氏亲自校勘《六韬》后为之作的序。所以，文中举出一些事例辩驳“伪书说”。他的最后结论是：“非文王时书，事之书耳。”肯定《六韬》是周显王时的史官传述姜望之言，虽然不是文王时代的书，但记的是文王时代的事。与孙氏观点接近的还有明人张萱，他说：“余意太公望尝为此书，久而亡去，今所传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，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，非望笔也。”（《疑耀》卷二）前者认为是周史传述姜望之言，后者认为是楚汉间的人补其亡失，意即今所见《六韬》非太公望亲笔也。

3. 姜望撰，后人增补说。

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近人余嘉锡。他对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“伪书说”作了详细的辨证，认为《汉书》儒家类著录的《周史六弢》，“班固既明著为惠、襄时人，又云孔子问焉，则其人必非太公，其书亦必非兵家之《六韬》”。他征引沈涛《铜熨斗斋随笔》卷四文，说明“六”是“大”字之误，“六弢”乃周史“大弢”之名。而且《庄子·则阳》有“仲尼问于大史大弢”句，《汉书》中的“周史六弢”即其人也，所以《汉书》又有“或曰孔子问焉”之说，此以人名命书名，否定了《周史六弢》为世传《六韬》的说法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道家类：“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。吕望为周师尚父，本有道者。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述者所增加也。《谋》八十一篇，《言》七十一篇《兵》八十五篇。”

余嘉锡根据这一著录，认为《六韬》是“《兵》八十五篇”中的一部分，其余是《阴谋》和《金匱》。他说，不能以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无“六韬”之名，就否定《汉书》无《六韬》之著录。“盖《汉志》著录之例，只以著书之人题其书，而不别著书名。《老子》不名《道德经》，《淮南》不名《鸿烈》……故《太公》之

书不名《六韬》、《阴谋》、《金匱》兵法等也，至《隋志》乃著之耳。”也就是说《汉书》以“太公”之名命书名，其中《兵》八十五篇，到《隋书》著录时才分为三，即《六韬》、《阴谋》、《金匱》。所以，他批评说，因为《汉书》中不见《六韬》的名称，而说班固未见《六韬》是错误的。进而指出：“班固自注云：‘吕望为周师尚父，本有道者，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述者所增加也。’是太公之书有后人增加之文，班固已明言之。班云近世，则增加之文，或出于西汉。其间有‘避正殿’之语，‘将军’之号，固不足怪。”（《〈四库提要辨证〉卷十·〈子部〉二》）在余氏之前，明人焦竑也说过：“《三略》、《六韬》，太公书也。然其中杂援军讖以足成之。”（《焦氏笔乘》卷六）

4. 伪托姜望撰说。

宋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·兵家》：“《太公六韬》五卷。世言太公撰，盖后人作。”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·兵书类》：“《六韬》六卷。武王、太公问答。其辞鄙俚，世俗依托也。”在陈氏稍后，黄震在他的《日抄·黄石公三略六韬》中也指出：“《韬》、《略》世谓出太公，虽李卫公亦云，以愚观之，伪书尔。”黄氏从语言到思想，包括《六韬》文中所讲的军队建制，全面否定为姜望的作品。明胡应麟亦云：“《六韬》称太公，厥伪了然。”他认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类著录的《六弢》，并非太公的作品。此书亡于东汉之末，到了魏晋时期，那些“谈兵之士”，掇拾散佚篇章以成世传之《六韬》，即以后《隋书》所著录的《六韬》。

清人否定《六韬》为姜望撰的言辞更为激烈。主要代表有三家：

①姚鼐。姚氏认为《汉书》著录的《周史六弢》不是今之所传《六韬》，“刘向、班固皆列《周史六韬》于儒家，且云‘惠、襄之间，或曰显王时，或曰孔子问焉’。然则其为‘周史’之辞，若周任、史逸之言无疑也。非言兵，亦无与太公也。”并批评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“于《六韬》直以为即今书”，“不足以言识”。在他看

来，今传《六韬》“微取兵家之说，附之太公，而弥鄙陋”。他还举例说：“周之权曰钧不曰斤，其于色曰玄、曰黑、曰缁不曰乌。晋、宋、齐、梁间市井乃有乌衣乌帽语耳，而今《六韬》乃曰斤曰乌。”姚氏的结论是：“世所有论兵书，诚为周人作者，惟《孙武子》耳，而不必为武自著，若其余皆伪而已。”（《〈惜抱轩文集〉卷五·〈读司马法六韬〉》）

②姚际恒。姚氏著有《古今伪书考》，有关古籍的辨伪这部书的影响最大。他确认《六韬》为后人伪托有三点理由：其一，《汉书》无《六韬》的著录，《隋书》始有著录；其二，虽然《庄子·徐无鬼》有《六弢》的名称，“从说之则以《金版》、《六弢》”，但《汉书》将《六弢》著录在“儒家类”，与今传兵家之《六韬》不是一部书；其三，《六韬》“‘避正殿’语，此乃秦汉事”，并非太公时事。又“胡元瑞曰：‘《六韬》有《太公阴符》篇云“主与将有阴符，凡八等：克敌之符长一尺，破军之符长九寸，失利之符长三寸而止”，盖为撰人之识阴符之义，以为符节之符也。’”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。提要引《庄子·徐无鬼》文，又引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引晋司马彪、崔骃注《庄子》文：“《金版》、《六弢》皆周书篇名。”证明战国之初原有是书。不过，这部《六弢》并不是太公的《六韬》。所以，提要根据《汉书》将《六弢》著录在“儒家类”，以及班固的自注，确认《庄子》、司马彪、崔骃所言《六弢》“别为一书，非今传《六韬》。今考其文，大抵词意浅近，不类古书”，书中“将军二字始见《左传》，周初亦无此名”，并以“避正殿”和“阴符”之符误为“符节”之符为例，推论世传《六韬》“未必汉时旧本”。

二、本文有关《六韬》作者的结论

上述四种观点，是从许多文献资料中进行整理归纳的。诸家的论述，限于篇幅，有的未能全部征引，也有与上述观点相同的其它资料，也未一一引证。

从上述的叙述中，不难看出，诸家的论证大多主要建立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与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著录上。诚然，目录学著作是考证书籍产生、流传、亡佚的重要依据，但是，在研究《六韬》一书的作者时，我们却不能忽视一个重大的事实：刘氏父子和班固撰述目录学著作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事情，与姜望生活的时代相隔 1000 年。即使《汉书》明确著录《六韬》为姜望著，也不能证明非后人的伪托，因为著录的时间与作者的生活年代相隔遥远，不能否认在漫长的 1000 年中无人以姜望名义伪撰《六韬》。同样，《隋书》著录《六韬》为姜望撰，而《汉书》无著录，也不能完全证明《六韬》就是魏晋人的作伪。这已由一九七二年银雀山出土的汉简《六韬》所证实。汉简《六韬》与今传《六韬》文字十分相近，证明《六韬》成书年代至少在西汉以前。所以，在《六韬》一书的作者问题上，无论是哪种观点，以《汉书》或《隋书》的著录为基本依据，是非常不可靠的。上述后三种观点，基本都建立在《汉书》或有著录或无著录上，即便观点是正确的，也不足以服人，下面有必要先指出上述诸家观点的某些缺失，然后得出我们的结论。

1.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：“《隋书》始载《太公六韬》五卷……唐、宋诸志皆因之。”此后，许多人在介绍评论《六韬》时也跟随提要的这一说法，笼统言之：“《隋书》之后，正统书录大都沿用其著录。”考之《新唐书》、《宋史》，或有云“不署撰人”，或云“不知作者”。宋郑樵直言“盖后人作”，陈振孙则讥为太公所作。正统书录并非大多都沿用《隋书》的著录。今见唐、宋时期的目录学著作著录《六韬》为姜望撰者，主要有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三家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欠审慎，故有后人承袭前人之误。

2. 明、清之际，否定《六韬》为姜望撰的人，比唐、宋更多，而且观点更为鲜明。其中黄震的论辩最为得力。他的论断主要建立在《六韬》一书的文字内容上。而其它几家的论证却主要纠缠

于“《汉书》是否有著录”、“《隋书》始有著录”。虽然引出“避正殿”之语、“将军”之号等证据，证明非周初作品，但有了余嘉锡等人的“后人增补说”之后，所引证据及其“伪书说”的观点显得苍白无力。

3. 孙星衍在《六韬》序中说：《六韬》“词亦古质，且多见唐以前书传征引，真古书也”。这话并不错。因为孙氏认为《六韬》是公元前400年左右，周显王之前的人传述太公之言的作品。公元前400年即战国初，那时的人所写的书，当然是“真古书”，基本与《庄子》同时。孙氏的错误则在于根据《汉书》著录的《周史六弢》，肯定《六韬》是周显王时人为传述太公之言而作，却不察周显王时代已离太公600年之久，何谓“传述”？相隔一代两代人的传述尚有可信，相隔600年的传述何信之有？用“后人传述太公之言”否定“伪书说”是毫无意义的。

4. 余嘉锡等人的“后人增补说”，为今人研究《六韬》的作者，提供了一个跨时代的非一人之作的思考。不过，余氏依据《汉书》另一条有关太公著作的著录，坚信《六韬》是太公之书，而且所谓《隋书》著录的《太公六韬》、《太公阴谋》、《太公金匱》，就是《汉书》道家类所著录的《太公》一书中有关《兵》八十五篇的分解，是难以自圆其说的。《隋书》除有太公《六韬》、《阴谋》、《金匱》三书著录外，另有“《太公兵法》二卷、《太公兵法》六卷”的著录，它们与《汉书》的著录“《兵》八十五篇”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倘若《阴谋》是从《兵》八十五篇中分解出来的，那么《汉书》中的“《谋》八十一篇”又何指呢？另外，《隋书》还著录有“《太公阴符铃录》一卷，《太公伏符阴阳谋》一卷、《太公三宫兵法》一卷”等，应当属《汉书》所著录的“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”《谋》、《言》、《兵》的哪一类呢？余氏在辨证中都没有回答。余氏辨证有许多可取之处，但此言尤为不可信。清沈钦韩《汉书疏证》：“《谋》者即太公之《阴谋》；《言》者，即太公之《金匱》，凡善言书诸金版；《兵》者，即《太公兵法》。”这

一解释在总体上与余氏相同，但在具体问题上与余氏有区别。如果依从了沈氏的解释，《汉书》的“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”中则仍然不包括《六韬》。凡此均属猜测，不可信实。

《六韬》是否为姜望所撰，我们必须从另外两个方面去分析。我国古代能确定撰者姓名的典籍，最早莫过于《老子》和《论语》。姜望生活在商末周初，比老子、孔子约早 500 多年。500 多年间也有不少著述，如《尚书》中的周人诰辞，《诗经》中的部分篇章，鲁国《春秋》等等，这些都不知撰人。若将署有作者姓名的著作向前推进 500 年，应该说是一件十分慎重的事。另外，看《六韬》是否是伪书，主要是《六韬》文字内容的本身。将《六韬》全书与《尚书》中的周人文诰相比较，一个浅近易懂，一个艰深晦涩，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时代的作品。而且《六韬》论权谋、兵法细致入微，亦根本不可能是《孙子兵法》前几百年的著作。只要有点春秋文献常识的人，将《六韬》全部读完，自然不会认为《六韬》是姜望所撰，如同读一篇今人的大白话文，不会误认为它是明、清人的作品一样。

“六弢”最早见于《庄子·徐无鬼》，其文云：

徐无鬼出，女商曰：“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？吾所以说吾君者，横说之则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从说之则以《金板》、《六弢》，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，而吾君未尝启齿。”

文中“吾君”指魏武侯，即魏文侯之子；徐无鬼是当时的隐士；女商是魏国的幸臣。魏武侯在位 26 年，即公元前 395 年—369 年，女商在这段时间里曾向武侯讲述过《六弢》。而且据唐成玄英对《庄子》的疏解，女商讲述的《六弢》是一部兵书，“横，远也；从，近也。武侯好武而恶文，故以兵法为从，六经为横也。”与后世所传的《六韬》当是一部书。所以，根据《庄子》的这一记载，我们可以推断《六韬》始创作于战国初年的魏武侯时代以前。

余嘉锡否定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类的著录，引述沈涛的考

释，认为“周史六弢”是《庄子·则阳》“大史大弢”之误，并没有足够的证据。孙星衍虽然肯定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类的著录，并将班固为什么将《周史六弢》列入儒家类作了很好的解释，但他认为是周显王时的史官所作也缺少证据。《周史六弢》究竟为谁作，班固也无把握，他提出了三种可能性：一是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间的史官，二是周显王时的史官，三是曾与孔子问答的史官。《庄子·则阳》云：

仲尼问于大史大弢、伯常騫、狶韦曰：“夫卫灵公饮酒湛乐，不听国家之政；田猎毕弋，不应诸侯之际；其所以为灵公者何邪？”大弢曰：“……”；伯常騫曰：“……”；狶韦曰：“……”。成玄英疏：“太史，官号也。下三人皆史官之姓名也。”

《则阳》篇解开了《六韬》作者之迷，始作《六韬》者当是曾与孔子问答的周朝三史官之一。由于是史官之作，故有《周史六弢》之称，由于曾与孔子问答过，故有“或曰孔子问焉”之说。《六韬》始出史官之笔是有根据的，今传《六韬》开篇就以记史的方式叙述：

文王将田，史编布卜曰：“田于渭阳，将大得焉。非龙非魮，非虎非黑，兆得公侯，无遣汝师，以之佐昌，施及三王。”文王曰：“兆致是乎？”史编曰：“编之太祖史畴，为禹占得陶，兆比如此。”文王乃斋三日，乘田车，驾田马，田于渭阳。卒见太公坐茅以渔……（《文韬·文师》）

清人孙同元所辑的《六韬逸文》，其中也有今传《六韬》没有的内容，如武王伐纣为父报仇，以及太公射丁侯等等，而这些多是以史的方式撰述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断定，《六韬》始作于春秋末年，也就是孔子的时代，后来女商读过，并向魏武侯讲述过。由于《周史六弢》开始记的就是有关文王、武王、太公的事，所以后人将其附会姜望撰。

女商见到的《六韬》没有后来世传《六韬》那么大的篇幅，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引晋人司马彪、崔骃注解《庄子》云：

《金版》、《六弢》皆周书篇名。

最初的《六韬》只是周书篇名而已，经后人不断增补，篇幅才逐渐增多，最后成书是西汉初年。春秋战国的著作，非出自一人之手笔几乎是通例，并非仅《六韬》是这样。上述诸家论例，《六韬》中有许多战国至秦汉的文字痕迹，则是很好的证明。银雀山汉简的出土，将《六韬》成书的下限定在西汉，是不用怀疑的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自汉简《六韬》出土后，有人撰文，否认《六韬》是伪书，这种认识是片面的。汉简的出土，只能证明《六韬》是西汉前的作品，而不是魏晋人伪托古人的著述。如果称《六韬》的作者是姜望，我们仍然说它是一部伪书。

三、《六韬》的内容及其流传

《六韬》自战国初年问世以来，历代盛传不衰。虽然是一部伪书，但由于假托太公名义，影响很大。姜望辅助文王、武王，有许多传奇的故事。相传他曾在商都朝歌当过屠夫，后来西至渭水垂钓为生，牧野之战协助武王一举完成灭商大业建立周王朝。他的传说不及周公正统，因为孔子信奉周公，周公的正统地位至高无尚，但在民间，传颂更多的是姜子牙，所谓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，妇孺皆知。《六韬》人们一般将它视为兵家之书，黄震在他的《日抄》中曾评论说：“大抵书之不切于兵者居半”，这话是很准确的。即使谈兵，深度和广度也远不及《孙子兵法》，其兵家之哲理更不如《孙子兵法》的深奥，而且有些篇章论“使用战具器械”、“军处险境”，非常具体机械，有失大家论兵风范。有些言论又相互矛盾，一边提倡“仁义道德”，一边又出了许多陷入于“不仁不义”的坏点子，诚如黄震在他的《日抄》中所批评的：“《文伐》十二节，皆阴刻陷入之语，岂文伐之义乎？”但是，它毕竟揉合了古代一些超人的智慧，论“谋”述“略”在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。而且有些议论已经超越了它那个时代的历史观，如《六韬·文师》：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。”又如

《武韬·顺启》：“利天下者天下启之，害天下者天下闭之。”发聋振聩，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真理之言。有些议论。还参杂了一些道家观念，表现出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思想，如《武韬·发启》：“全胜不斗，大兵无创，与鬼神通。”“天道无殃，不可先倡，人道无灾，不可先谋。必见天殃，观人灾，乃可以谋。”又如《武韬·文启》：“何忧何嗇，万物皆得；何嗇何忧，万物皆遁。政之所施，莫知其化；时之所在，莫知其移。圣人守此而万物化，何穷之有？”另外，《龙韬》中有关“论将”、“选将”、“立将”的一些标准和准则，对于如何选拔任用人才，以及如何认识人的品性优劣、才能高低，是极富有参考价值的不可多得的议论。《六韬》分《文》、《武》、《龙》、《虎》、《豹》、《犬》六韬，计60篇，二万余言，积极的和消极的，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论述，优劣参半。战国时期的大商人白圭曾说：“吾治生产，犹伊尹、吕尚之谋，孙、吴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是故，其知不足与权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仁不能以取予，强不能有所守，虽欲学吾术，终不告之矣。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六十九》）或许正是由于《六韬》“论谋”大大超过“论兵”，才表现出盛传不衰的文献价值。

《庄子·徐无鬼》记载，魏武侯不苟言笑，大臣女商引见徐无鬼，徐无鬼几句话就让武侯高兴起来。女商对徐无鬼说，我们想了许多办法都未能让吾君高兴，从远的方面，我曾向他讲述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从近的方面，我曾向他讲述过他所喜爱的《金版》、《六韬》，吾君都未曾笑过。这是最早记载《六韬》世传情况的文献资料，先秦其它文献资料尚未发现有《六韬》的记载。

到了汉代《六韬》的流传似乎比较广泛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《六韬》与今传《六韬》文字大同小异。汉简的墓主，据考证是西汉武帝时期的人。与此同时，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也有《六韬》的记述：“故通许由之意，《金縢》、《豹韬》废矣。”许由，传说唐尧时代的隐士，尧曾以天下让之，他退而不受。《金縢》，是《尚

书》的篇名；《豹韬》，即《六韬》中的一篇。这意思是：如果通晓许由不与世争的意旨，《金縢》、《豹韬》这样图王霸之业的文章就会废弃。可见《六韬》在淮南王刘安时代，也就是汉武帝时，有比较大的影响。这里应当指出，按照《淮南子》的上下文意，作者引述了《金縢》、《豹韬》，对它的理解却是错误的。《金縢》中的诰辞为周公所作，内容是因武王有疾，周公向先王祈祷，请求让自己代替武王去死。看不出《金縢》是什么“阴谋图王之书”。既然《金縢》为周公所作，《精神训》中《豹韬》与《金縢》并文为对，作者的意识中自然认为《豹韬》乃太公之作，因为二公同是辅佐文、武二王图霸业的一代名臣。这《豹韬》当然无它指，即《六韬》中之《豹韬》。今读《豹韬》也无“谋略”可言，与《文》、《武》、《龙》三韬相比，显然有很大的区别，讲战术而已。如《林战》、《突战》、《敌强》、《敌武》、《乌云山兵》、《乌云泽兵》、《少众》、《分险》等，都是具体讲述处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同敌人作战。不过《精神训》重在议论，汪洋恣肆以说理透彻见长，未必考究个别史实。凡遇这种情况，我们大可不必信以为真，或许作者仅以《金縢》、《豹韬》指代周公、太公而已。高诱注《淮南子》、余嘉锡撰《四库提要辨证》，均将《金縢》、《豹韬》释为图霸业的阴谋之文，而不作其它必要的解释，不免有失查考。

东汉以后《六韬》一书十分盛行，文献有记载的主要是在东汉后期及其末年，与时局不稳、战争频繁有关。《后汉书》的《左雄传》、《徐璆传》李贤注，均引有谢承《后汉书》文，称徐淑“善诵《太公六韬》，交结英雄，常有壮志”。徐淑，徐璆的父亲，汉灵帝中平元年徐璆曾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军。又《后汉书·何进传》：汉灵帝中平五年，“天下滋乱，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，两宫流血。大将军司马许凉、假司马伍宥说进曰：‘《太公六韬》有天子将兵事，可以威压四方。’进以为然，入言之于帝”。三国时期，《六韬》是兵家必读的谋略书。刘备、诸葛亮、孙权曾以此书教人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诸葛亮集》引先主

遗诏敕后主曰：“汝父德薄，勿效之。可读《汉书》、《礼记》，闲暇历观诸子及《六韬》、《商君书》，益人意志。闻丞相为写《申》、《韩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六韬》一通已毕，未送，道亡，可自更求闻达。”一个是到临终前还谆谆教导儿子研习《六韬》等书，一个还亲自手抄一份作为幼主的读本，可见当时《六韬》与《商君书》等，有同等重要的价值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吕蒙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江表传》曰：“孤少时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，惟不读《易》。至统事以来，省三史、诸家兵书，自以为大有所益。如卿二人，意性朗悟，学必得之，宁当不为乎？宜急读《孙子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及三史。”这是孙权当年在战火连天的日子教训吕蒙、蒋钦的话。

唐、宋时期，汇编典章制度、编纂类书接连不断。这类书籍大部分都辑录有《六韬》的内容。如《群书治要》、《通典》、《意林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玉海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小学绀珠》等等。另外，注疏先贤典籍，是唐代学术的一大特点，如《礼记》孔颖达正义、《史记》司马贞索隐、《文选》李善注等等。这些注疏也引用了《六韬》的许多内容。将各家引文相互比较，并将引文与今传《六韬》比较，篇名和文字有些并不相同，从中可以窥见，唐、宋时期《六韬》的传本较多。古人的引文，也有今传《六韬》没有的内容。所以，前人曾经推断，有可能是宋神宗元年中颁行武学，定《武经七书》时对《六韬》有所删削（见孙星衍《六韬序》）。今敦煌遗书中有原本《六韬》残卷，可窥见唐本面目。从以上的叙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《六韬》在唐、宋时期可谓流传极广，而到了宋神宗时，《六韬》的地位则达到了颠峰。宋仁宗曾有意建武学，既而中辍，“神宗元丰三年夏四月乙未，诏校定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李靖问对》等书，镂板行之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三）。当时定七书为武学官书，是经朱服、何去非二人勘正的。查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宋朝流传的唐代以前的兵谋书大约

有 150 种,《六韬》能在激烈的竞争中“名中金榜”,可见它在宋代的影响之大。正是在《六韬》盛传之际,开始有人对它的撰者提出怀疑,首先发难的是南宋人郑樵。自此以后,明、清两代对“姜望撰”不断提出疑问。

明、清之际,学术界研究《六韬》,主要是研究《六韬》撰人,也算得上是“热门话题”,前面已有较详细的叙述。另外注解《六韬》和搜辑《六韬》逸文的也不乏其人。明刘寅撰有《六韬直解》。在此之前,仅有宋人施子美撰《六韬讲义》。搜辑逸文的有清孙同元《六韬逸文》一卷、黄奭《六韬》一卷、王仁俊《六韬佚文》一卷。随着《武经七书》的流传,《六韬》有景宋钞本、明刊本、清刊本。今传《四部丛刊》的《六韬》,就是景宋钞本的影印本。从明代至本世纪三十年代,《六韬》的各种刊本有二十多种。许多丛书也刊收了《六韬》,如《武学经传三种》、《三代遗书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续古逸丛书》、《重刻武经七书》、《子书百家》、《百子全书》、《子书二十八种》、《子书四十八种》、《平津馆丛书》(嘉庆本、光绪本)、《长恩书室丛书乙集》、《半亩园丛书·兵法汇编》、《兵书七种》等等。其中《平津馆丛书》的《六韬》,是经孙星衍校勘过的,是较为完整的本子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专一研究《六韬》的文章不多,因为银雀山汉简《六韬》的出土,才有几篇介绍(不是专一的《六韬》介绍)并与其它几种兵书比较的文章。本文力图对《六韬》的作者及流传作一全面总结,限于学识,难以尽意,错误之处,有请大方之家不吝赐教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

(本文责任编辑:曹月堂)